

■ 文化传媒研究

礼物的秘密

凡延海, 刘晓蓓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大理 671003)

摘要: 礼物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对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变迁具有独特的价值; 赠送礼物表面上看是赠与者慷慨大方的高尚道德的展现, 事实上背后隐藏着强制性和义务性; 礼物, 看似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不经意的举动, 其实隐含太多不被人们注意的内涵。

关键词: 礼物交换; 赠礼; 回礼; 强制性与义务性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7)06-0006-04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6.002

Study On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Gift

FAN Yan-hai; LIU Xiao-bei

(School of Marxism, The University of Dali, Dali 671003, China)

Abstract: Gift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of anthropology, and there will be special valu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s. Gift exchange superficially is a show of generous generosity of the noble morality. In fact, it presents the coerciveness and obligation; Gift exchange, as a casual act in our daily life, implied too much meanings that few people knows and this paper will talk about these connotations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Gift exchange; gift; return gift; coerciveness and obligatory

《礼物之谜》是莫里斯在继承反思莫斯关于礼物的理解, 在分析礼物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的基础上, 洞察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交流、交往的价值, 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及运行机制。

一、“礼物”主体的多样性

从群体的角度出发,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 在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支配下, 企业间的竞争力越来越激烈, 为了公司持续运营及获取更高利润的目标, 各个公司都想方设法的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减少劳动力数量以降低成本, 提高竞争力; 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 越来越多的工人失去工作, 丧失家庭生活的来源; 而他们重新进入职业市场的机会

十分渺茫; 久而久之, 越来越多的失业者把政府救济或是其提供的福利待遇作为其生活的主要来源; 为数众多的失业者构成一个群体, 政府救济成为一个礼物赠与给失业群体。从个体的角度出发, 人是群居的动物, 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 个体总要依附于集体才能生存, 然而这个集体并不给每个人提供生存的必要条件, 它仅仅给个体提供了环境。例如原始社会中, 正值壮年的个体要跟随集体去打猎, 才能获取生存之需; 现代社会中家庭中的个体也要去工作, 用工作的报酬换取生活所需。

政府除了扮演直接赠与礼物的角色, 还扮演着鼓励和呼吁社会的其他组织、个人赠与礼物的角色。一种是通过征税的方式对企业征收各种税, 另一种

收稿日期: 2016-11-05; **修回日期:** 2017-01-24

作者简介: 凡延海, 男, 山东单县人,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晓蓓, 女, 山西永济人,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是通过征收消费者的消费税(消费者可能并不知晓)。总之,税是一种组织或个体被强迫赠与的礼物。此外,政府的呼吁形成了各种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等等,并且对赠与的呼唤越来越“官僚化”,“它使用各种媒体来强调知晓,去触及、感动和呼唤人们的慷慨,向一种抽象的人类团结呼吁,这种抽象的人类团结存在于某种超越了所有文化、阶级、等级、语言或身份差别的地方”^{[1]5}。而自然灾害如非洲某个地方遭遇某种传播速度极快、毒性极强的瘟疫并且当地的政府又无力阻止的时候,亦或是人类战争中正义的一方以无辜百姓死伤惨重时的呼吁,这种呼吁更具影响力,响应的组织和个人更多。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土著居民十分的慷慨、不计得失,他们没有财产的概念,毫无私心。例如当你在森林中行走的过程中,正好碰到一个素未谋面的猎人打了一个猎物,哪怕打到的是一只兔子,也会共同分享这只兔子。这种现象用现代社会大众的视角看简直不可思议,令人十分费解,所以使有较大生活压力与社会压力的大多数人都向往这种“桃花源”式的生活。但是莫斯通过阅读相关资料认为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并非一定是人的真实情感,对神和死者的献礼也是为了祈求获得其庇佑,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目的。因此,赠送礼物背后隐藏着义务性与强制性,对如同市场经济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使人们热衷于赠送礼物。

莫斯解说礼物赠与与事实是三种义务的结合:赠与、收到,以及一旦收到礼物后马上要回赠礼物。对于绝大多数个人或群体来说,不被牵扯进赠礼与回赠的游戏中,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的地位、身份已经远远高于参与这个游戏的其他竞技人(比如你是皇室贵族),亦或是你的身份与地位太低,被排除在这个游戏之外(比如你是别人的奴隶)。所以在礼物赠与和回赠的游戏中包含了一种暴力,这种暴力来自于赠礼者和社会关系,因为只有通过财富的手段才能获取权利和声望。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一种社会现象的全球性解说理论,它把整个社会领域视为种种交换形式的结合,而其源头则要到人们头脑的深层无意识中寻找,在无意识的象征化能力中寻找。莫里斯在与巴鲁耶人的社会调查中认为每件事物的逻辑都排除着通过财富礼物和回赠礼物来获得权利的可能性^{[1]7-8}。莫斯的理论仅涉及到个体间或以家庭、小群体为单位的礼物问题,没有考虑到影响力更大的政府或市场调节的角色。回礼具

有义务性和强制性,这点我们很好理解,在接受礼物之后,赠与者便对受赠者享有当然的优越权,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赠与者的“食客”,直至回赠礼物之后,这种强制性和义务性才会慢慢消失。另外,送礼和接受礼物同样具有强制性和义务性,二者的共同目的是社会的正常的运转秩序,赠与礼物能从受赠者那里获取因“亏欠”而让渡的被统治与被管理权,赠与者当然享有统治、管理权,彼此结成一致对外的统一联盟。接受赠与的义务性在于,作为联盟系统中的个体,必须要接受赠与,否则便是对统治者的反抗、宣战;此时,赠与者便会用暴力、战争等手段证明其权威不容侵犯,以继续其统治;而你便会成为其证明力过程中的牺牲品,除非你有能力战胜其征战,随后便会形成另一个新的赠与礼物与接受礼物的相互关系。前例中为什么会和陌生人分享猎物的疑问,现在就不证自明了。赠礼的目的是获得荣誉,逐渐形成受赠者让渡的被统治权,当这种荣誉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和管理秩序,赠礼者理所当然的升级为统治阶级。列维-斯特劳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在莫斯礼物交换研究的启发下,得出了所有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交换^[2]。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人们认识到禁止乱伦的必要性,由于这一禁忌的限制,各个群体间只能交换女性来获得种族的繁衍,这种女性的交换也逐渐从个别区域扩展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而伴随着女性的交换必然出现物质的流通和思想观念的碰撞,最终演变出礼物的交换。莫里斯指出,西方社会存在经济排斥(失业)和社会整合(救济)的悖论,礼物赠与起着缩小社会差距、增进不同或相同阶级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理解的机会的积极作用,拉近了彼此的关系,加深了相互的感情,使社会能够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正常运转。还指出礼物赠与背后更深层次的消极后果:“排除之后的整合,物质整合时的心理整合与心理排拒”。以此呼吁政府或社会的救济及各种慈善组织、个人的捐赠都要顾及受赠者的人性尊严。另外,莫里斯还认为权利由伟大之人掌控,他们不一定拥有无尽的财富、资源,而是继承了体现着权利的神圣之物。例如封建社会时期君王的儿子天生拥有成为下一代君主的权利。莫里斯的理论在封建社会及以前是适用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值得商榷的。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二战时期为罗斯福和丘吉尔所奉行铁腕政治,他们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成为历史中伟大人

物毫无疑问。但是和平年代或国家没有大的灾难的时候,权利一般是被国家的各大财阀集团所掌控;例如美国近几届总统就职前为赢得选举所做的一系列准备,身后如若没有各种财团的支持恐怕最后也很难当选,当其竞选成功之后,顺理成章的成为其背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二、“赠与”与“回赠”

赠与礼物和礼物的回赠,使双方的关系更亲密。单方赠与礼物或双方互换礼物,可以使原本陌生的两个人之间变得熟悉;使因冲突而产生彼此都认为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双方慢慢变的相互理解,矛盾也慢慢消失;当你身处人生绝境时,受赠的礼物拥有使你看到希望的力量;例如现在大众媒体上所呼吁及给予极度赞扬的各种慈善组织,它们鼓励着的人们慷慨,如果这些慷慨用在身患绝症,又无力治疗的病人身上真的能救人一命。总之,礼物增加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使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社会问题得到缓解。

礼物的赠与是个人或集体将自己拥有的东西转让给别人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一定是受赠群体的请求。如果礼物的赠与不是基于自愿行为,只能称之为敲诈勒索或纳税,这是一种“变质”的礼物。礼物的赠与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形成这样一种关系:赠与人对受赠人享有一种优越性的权利。虽然礼物是无偿的赠送,但受赠者在接受赠与的那一刻便在内心深处负有欠对方的义务,所以要在某些场合因对赠与者感恩戴德而作出违背真实想法的行为,至少在礼物没有换还回之前是这样。正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由于别人的赠送而使自己获利,内心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亏欠感,当对方需要回报时便会奋不顾身的去“回赠礼物”。由此,“双方的关系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会转化成上、下两个阶级,如果这种阶级已经存在,礼物便表达着它,并使它合法化”^{[1]30}。对于刚赠即还的礼物,表面上看似一种毫无意义的赠与和回赠,事实上创造了一种并不因回赠而取消的债务。这种礼物的即时回赠不是返还,而是再赠;使彼此间形成了一种联系更为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双重关系。比如,虽身为同事但并不熟悉且之前没有来往的甲、乙二人;某天,甲带了2个苹果,把其中一个自己不想吃的送给了乙,乙在接受苹果的时候,马上给了甲一个面包,虽然苹果和面包并非贵重之物,但甲、乙二人很可能因此而渐渐的熟悉起来,并在工作中形成同盟,共同维

护双方的利益,彼此关系也随着交往的频繁而更加密切。

三、“献礼”与“福佑”

生活中的祭祀十分常见,例如特定的日期对祖先的供奉和缅怀。宗教的祭祀活动中,所做的一些仪式,内容主要是供献和毁坏供献之物来向神献礼。莫斯认为死者的精灵和神是万事万物及财富的真正主人,通过对他们的供献,来获取其保佑,解释当时因人的认知所限而不能解释的问题,指引生活得道路,这种与神的交换是最为必要的,否则会面临巨大的灾难。而人如此敬神和死者精灵的原因,在于人类认为他们生存的一切都来自于神的恩惠。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其中生理的需要是最低的需要,主要是指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认为是神的保佑,才能打到猎物,农作物才会有好的收成等,总之,人类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保驾护航。即便是有些年份自然灾害频发,导致庄稼颗粒无收,也会认为这是神的警示;所以即使饿着肚子,却依然把自家仅有的食物拿来供奉神,以祈求其谅解,并继续得到其惠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古埃及的法老。法老被认为是居住于人间的神,世上的一切生命和食物均来自法老的恩赐;把自己所有的财物作为礼物,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及孩子的生命作为礼物献给法老,都足回报其恩情。普通人对法老的敬重却无意间使自己成为距法老最近的祭祀剥削、奴役的对象,形成上、下两个阶级。

神圣之物是某种类型的社会关系,人们以此来维持与事务起源的联系^{[1]207}。在这种相互关联中,作为生物体意义上的个体消失了,存在的是人们自己设想的一种神。比如巫师,其实巫师在日常的大部分时间是扮演者一个普通社会人的角色,但是一旦穿上巫师的一套行头,它立刻变成一种神圣的存在,为众人祈福。当这种仪式结束之后,又回归到社会人的角色。神圣之物是只能保留不能赠与之物。因为拥有它就可以拥有某种众人认为只有神才具有的超自然力量,你就拥有控制普通人的行为及事情进程的神秘力量。

四、当代农村结婚中彩礼的“夸富宴”

莫斯认为,在氏族、婚礼、成年礼以及对祖先的膜拜等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由仪式、法律呈现和经济呈现等组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而竞争与对抗的原则贯穿于这些仪式,斗争有可

能使部落首领和显贵丧命,另外,人们为了压过与之斗争的对方首领及其盟友,不惜将自己积攒下来的财产毁坏殆尽^{[3]7-8}。最终目的是通过毁坏自己乃至家族的财富彰显自己的实力,以获取人们公认的比失败的一方更高的社会地位。这就好比两个人斗气,双方都绞尽脑汁的采取各种手段赢得上风;双方把自己近乎所有的财产拿出来,当着对方的面,一件件的把这些财物销毁,而且表面还流露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最终结局是谁销毁的财务多谁获胜,胜利的一方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获得比对方更高的社会地位。

放眼现在中国农村结婚彩礼的现状,又何尝不是一场21世纪盛大的“夸富宴”呢。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但封建社会的一些糟粕思想也深植于国人的“骨髓”,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的这种状况更甚。农村历来就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养儿防老”、“嫁出去的闺女一泼出去的水”的观念在广大农村依然盛行。父母更是把为学历也不高的儿子“说上媳妇、讨上老婆”当作老两口毕生奋斗的目标,哪怕因此而债台高筑,余生在还债中度过也在所不惜。因此年年的彩礼钱也是水涨船高,彩礼由原来的1001(寓意千里挑一)、3300(“两边一起‘轩’”意思是两边愈来愈富裕)、10001(寓意万里挑一)到现在的66000、88000、“三斤三两”(面值100的纸钞重3.3斤,折合人民币13万多)、“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的钞票,一千张100的钞票和不定数目的50的钞票),外加“一动不动”(在县城或市里买一套商品房和一辆价值10万左右的车)。这对年收入只有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农村家庭来说怎么可能负担的起啊!所以父母只能弓着腰、驼着背去敲亲戚、邻居的门借钱,不够的话就去贷款,甚至有的年轻小伙为了筹够彩礼钱去偷、去抢,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而一些女方家长却有攀比的心理,好像如果收到的彩礼比邻居少的话,就认为自己不如邻居,因此,在好面子的驱动下,导致彩礼节节攀升;另外,辛辛苦苦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转眼间变成别人家的啦,就想多收点彩礼来补偿这些年的付出,这也助推了彩礼只涨不降趋势。另一些家庭条件较好的男方为了彰显自己的财富,一次次的抬高彩礼的数额。这与古代西方社会“夸富宴”中倾其所有以获得对手及旁观者的尊重又有什么区别呢?唯一的进

步是献出来的财富没有被毁坏,而是装进了对方的腰包并顺便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更使男方家庭背上沉重的债务,这也给将来家庭矛盾埋下了祸根。

这种农村彩礼的“夸富宴”与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农村彩礼“夸富宴”的盛行,导致人们崇尚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或造成贫富分化、滋生犯罪等现象,影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进程。农村彩礼“夸富宴”的盛行也与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格格不入。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人民幸福不仅仅是收入越来越高、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住房面积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指人民的心理及精神状态的满足,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彼此间增加了一份理解、尊重与欣赏,有一颗不计个人得失、心怀天下苍生和甘于奉献的心。中华民族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只要我们每个人能够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良好的社会风气好转指日可待。

总之,莫斯对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夸富宴”与特罗布里恩得群岛的“库拉”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莫里斯通过《礼物之谜》对莫斯的礼物理论进行了反思,莫里斯认为,礼物在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中的有着重要作用,根据礼物主体有着多样性的特点,礼物可以分为赠人之物和赠神之物,特别是赠神的礼物,是对莫斯的礼物理论和传统礼物赠与理论提出了挑战。虽然莫斯、莫里斯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中对礼物理论的阐发,但在我国当今社会,他们关于礼物的理论对解释或反思我国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农村彩礼“夸富宴”等现象仍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莫里斯·古德利尔. 礼物之谜[M]. 王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 才佳兴. 礼物之谜与社会幸福——论礼物流动的社会意义[J].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1):68—71.
- [3] 莫斯.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 汲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学术编辑 黄彦震]

[责任编辑 雷润玲]